



老子 太上老君

道家看生命：喜悅，樂道，順天

● 柳存仁

—

香港的道教各界人士今天舉辦道教節，三月九日正是舊曆的二月十五日，這是中國民間傳說上一向紀念的、也曾經官方規定的老子的誕辰。所以這個日期，並不是隨便說說的。不過我們平常讀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老子雖然是古代的大哲學家、大思想家，歷史上第一個替他做傳的西漢司馬遷，《史記》裏記載說孔子也說他「吾今日見老子，其

祭

猶龍邪！」（所以北宋哲宗時的悟真大師賈善翔就寫了《猶龍傳》，《道藏》555），神龍見首不見尾，我們怎麼會知道他的生辰呢？但是《猶龍傳》和許多旁的書，已經有「二月十五日」的記載了。這《猶龍傳》的記載，還不是最早的，我們要是一定要



追溯它的根源，更早的記載最謹慎地說要在唐朝，比賈善翔的時代還要推前三百五十年左右到唐玄宗特別崇奉老子的時候。老子被崇拜為「聖祖」，也是從唐代開始，最初是因為老子姓李，就是李耳，算是唐朝皇室的祖先的關係。但是這個估計，只能說是最謹慎的。稍微寬鬆一點，現在倫敦藏的敦煌卷子《老子西昇化胡經·序說第一》(S1857)和巴黎藏同經殘卷(P2007)都有「太上老君以殷王湯甲……庚辰之歲二月十五日誕生於亳」的記載，這些卷子鈔寫的時代，可能更在唐玄宗之前。這些說法的開始恐怕都是由於民間的，民間的崇拜奉行久了，傳染所及，習俗的薰習慢慢地也會把它傳布到更遠更廣的地方，以及從民間影響到上層社會。這種情況，許多別的信仰、別的崇拜，也是一樣。基督教把新曆十二月二十五日當做耶穌的誕辰，聖誕節在香港還是官方的公眾假期。這個日期，也只是民間信仰，約定



俗成的。這個日子本來是冬至的節日，紀錄上知道大約在中國歷史上晉武帝的時代(公元274，三國的吳國還沒有亡的時候)是羅馬王Aurelian統治的時代，這一天是太陽生日。基督教在埃及的Gnostics(我們譯做靈知派罷？是一個特別的教團，他們自稱有許多別人沒有的神秘經驗)又把聖誕節定在一月六日或一月十日。其實，就是在現代，許多不同的民族對同一個信仰也有不同的崇拜日期。

唐朝的帝室差不多是從一開國就崇奉道教和老子的，玄宗並不是第一個人，自然也不是最後的一個人。在他以前，他的祖父唐高宗(就是武則天的丈夫)，不僅推崇道教，乾封元年(666)二月，剛在他封禪泰山之後不久，他就去亳州老君廟祭祀，追上尊號稱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舊唐書》卷5〈高宗本紀下〉)。高宗時有一位吳天觀的觀主尹文操，後來又兼宗聖觀的觀主，他還編過記載當時知道的道經的目錄，叫做《玉緯經目》。高宗封禪之後，儀鳳四年(679)教他編寫老子的傳記，這部傳記完成了，就是「一部凡十卷，總百十篇」的《太上老君玄元皇帝聖紀》(《古樓觀紫雲衍慶集》，《道藏》605/卷上/7b；《舊唐書》卷47〈經籍下〉)。可惜這部應該是最早的、以宗教立場寫成的完整的老子傳記，到宋代還存在的(《宋史》卷205〈藝文四〉)，後來散佚了。我們現在無從

知道它可曾記載老子的誕辰，或者唐高宗封老子做玄元皇帝的乾封元年二月，是不是因為那天是老子誕辰的關係。

從南北朝到南宋，那麼悠長的時間，自然有不少的道經或是道教的書籍，曾經提到老子出世的。可以注意的是比較切合我們現在希望解決的問題的，除了敦煌卷子，是前面提過的《猶龍傳》和我們知道最遲在南宋高宗紹興中改定的《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見葉德輝《觀古堂書目叢刊》)裏面已出現的《太上老君金書內序》(《道藏》554，也見《宋史》卷205〈藝文四〉)，還有南宋光宗紹熙二年(1191)觀復大師謝守灝進呈他著九卷《混元聖紀》(《道藏》551-553)，和也是他編的未署著作年月的《太上老君年譜要略》及三卷的《太上混元老子史略》(《要略》、《史略》俱見《道藏》554)。把《混元聖紀》等三部同是謝守灝著的書比較，《要略》和《史略》兩部篇幅較短，《史略》可能成書較早，編者只署「廬山清虛菴道臣謝守灝編」，令人知道這時他還沒有大師、高士的封號。

以上提到的這五種書，雖然其中有三種是一個人著的，它們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從信仰宗教的傳統來說，它們說老子的降生根本不止一次，從創造天地的時候起(《道藏》1059的《太上老君開天經》和敦煌一些卷子像S2295《老子變化經》不過是一個例子)，老子每經過



一個時期看見世界有苦難了他就再降生，譬如說：黃帝時候他就是廣成子，顛頊時候他就是赤精子，……但是正像《要略》說的，「雖分身應化，隨世立教，竟則隱，於在世未有誕生之跡」(3b)。那麼，老子什麼時候，才有「誕生之跡」呢？我們幸運得很，這五部書都異口同聲地告訴我們，老子是商代武丁(敦煌文卷說湯甲)九年庚辰二月十五日降誕的，詳細一點的更說誕生的地方「亳之苦縣瀨鄉曲仁里」(《要略》4a，《猶龍傳》3/3a)；《金書內序》也說老子「降於有亳之地」(1b-2a)。說誕生的地方是「苦縣厲鄉(厲音瀨)曲仁里」，自然《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是它在古籍裏最早的根據。謝守灝的《混元聖紀》為什麼把唐代一向尊為玄元皇帝的老子改了「混元」稱謂呢？《混元聖紀》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說「七年甲寅，正月，車駕詣太清宮朝謁，親奉冊寶，上尊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御製〈老君讚·並序〉」(9/35a)，《要略》13a 還說真宗去的太清宮在亳州。這件事情也見《宋史》卷8〈真宗本紀三〉，不過《宋史》說上册寶給老子是前一天去的大臣王旦，真宗第二天才去朝謁。謝守灝把承襲唐代尹文操的《玄元皇帝聖紀》用的書名改做《混元聖紀》，正見他的奉行國家功令。

說老子是商代武丁時候誕生自然不是事實，但是像我上面引證的，這個二

月十五日之說不是宋代的人草創的，它的出處至少不遲於唐玄宗。這裏書本上的材料有三條可供比較。《猶龍傳》時代稍早，它說：

明皇開元三年(715)，敕天下置開元觀。御製〈混元讚〉曰：「爰有上德，生而長年。白髮垂相，紫氣浮天。函谷關右，經留《五千》。道非常道，玄之又玄。」(5/20a-b)

到了謝守灝編的《要略》，便添了玄元節，還說這一天是老君誕辰：玄宗開元三年乙卯，東封岱嶽回，謁亳州老君廟，親書《道德》二經俾刻諸石。以老君降誕日為玄元節。御製讚文，書於寶帳額上。(原注云「見《實錄》」，大概指謝守灝編的《太上實錄》，元代焚經後這書已佚。)(10b)玄元節的話，兩《唐書》的〈本紀〉、〈禮儀志〉、〈禮樂志〉……都找不到痕跡。玄宗封禪泰山是發生在十年之後，天寶十三年(725)十一月的事情。天寶三年這一年山東正在鬧蝗蟲，皇帝不會東巡，也沒有到過亳州。

不過，關於玄元節的記載，稍後還是有記載的，就見於同一個作者的《混元聖紀》。它說：

玄宗開元三年二月十五日丁卯，以老君降生之辰為玄元節。御製〈玄元皇帝讚〉曰「……」，親以紅粉版八分書，置老君殿寶帳額上。(8/22b)

這首〈玄元皇帝讚〉的文字和前文



引過的〈混元讚〉的字句完全相同，只是中間多了八句，恐怕《猶龍傳》缺的句子是賈善翔刪掉的。他又把這篇讚的題目擅改了原名，忘記了歷史性的重要，這也有些荒唐了。謝守灝清楚地指出玄元節就是紀念老君降生的，這一點似乎很重要，如果我們要紀念老子的誕辰，不論怎麼說這個二月十五日的節日，從玄元節開始到今天已有一千二百八十六年的歷史了。雖然這個日期的真實性是飄渺的，說這很長的一段時間人們曾經紀念過它卻是事實。這些材料，我想研究宗教學、民俗學、人類學的人，是應該知道的。

《混元聖紀》沒有提開元三年玄宗封泰山、去亳州的事情，這裏的慎重是可取的。他把「帝東封迴，謁老君於亳州舊宅……」析做獨立的另外一段（8 / 23a），自然比他的舊稿《要略》要好，但是這一段卻沒有時間的紀錄。下文沒有另分段一開始就說「元年辛酉……」，記的是那一年亳州老君舊宅斬伐枯檜出現異跡。這一個階段歷史上沒有元年是辛酉年的，檢《猶龍傳》（5/21b），知道說的是開元九年的事情。這恐怕是謄錄時的錯誤。

下面還有兩條可以補充的證據，時代是晚唐和五代初。《混元聖紀》卷9 / 12b說：

武宗以開成五年庚申（840）正月即位，二月敕：「玄元皇帝降生日，宜為

降聖節，休假三日。」

這一條我們倒是能夠從正史裏找到相關的記載的。檢《舊唐書》卷18上〈武宗本紀〉，開成五年二月：

敕：「二月十五日玄元皇帝降生日，宜為降聖節，休假一日。」

這條證據的可貴，是它正確的說明這個節日是二月十五日，並且又替前人使用過的玄元節起了新的名稱。這話也反映出在它之前的確有過一個玄元節的名稱，以後就該叫降聖節了。「休假一日」和三日是有出入的。《猶龍傳》卷6/4b說「武宗會昌元年敕：『以二月十五日大聖祖降誕之日為降聖節，仍令兩京及天下諸州府設齋、行道、作樂；賜大酺三日，軍期急速亦不在此限，永為常式。』」武宗的哥哥文宗是開成五年正月暴卒的，他死後武宗搶了帝位，下詔慶祝降聖節的日子，照《舊唐書》是在同一年二月，次年才是會昌元年。大酺是聚眾會飲，表示歡樂，因為古代照漢律，平常三個人無故會飲是要處罰的，所以大酺也有開禁的意思。但是這裏又有一個問題。兩處道籍的記載都說休假或開酒禁是三天，《舊唐書》卻說「休假一天」，未免煞風景。不過《混元聖紀》裏自己也有反證。《聖紀》卷9/28a唐明宗天成三年（928）正月云：

中書奏：休假令二月十五日玄元皇帝降聖節休假三日，准會昌元年二月敕，休假一日。伏請准近敕。從之。



這裏和上頭說的是一件事情。這一段說休假祇一天，是和《舊五代史》卷39〈明宗本紀五〉的記載完全符合的，三日之說可能是誤記。

二月十五日在唐、宋間是個有官方支持，也是民間社會的宗教活動，這些都已經證明了。後來明、清時代的人，他們要是想紀念老子或宗教上的太上老君，卻不記得日期，猜想他們未必花功夫去尋找太多的參考書，因為他們只要隨便翻一翻那本曆書，就知道了。《道藏》1108《諸神聖誕日玉匣記等集》說二月十五是太上老君聖誕。其他的一般流傳的書，像明神宗萬曆元年（癸酉1573）南京三山富春堂刻的《搜神記》（《道藏》1105，卷1/6b所從出），明寧獻王朱權編的《天皇至道太清玉冊》（《道藏》1109-1111卷7/4a），都有二月十五日老君誕生的日子。朱權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個兒子（明太祖有二十六子），他在詞曲方面的造詣很深，編的《太和正音譜》常為研究雜劇和散曲的人所稱道，晚年住在南昌，就編了這一部小型的道教類書，我們隨便閱讀可以增加許多道教的常識。在這部《玉冊》裏，他不止自號「南極遐齡老人懼仙」，還自稱「南極沖虛妙道真君」，是一位很風趣的人。他稱老君的誕辰為真元節。這不是杜撰的，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曾「以二月十五日太上混元上德皇帝降聖日為真元節」（《宋史》卷112〈禮志十

五〉）。《道藏》32《太上玉華洞章拔亡度世昇仙妙經》結尾有一段跋文，提到皇統三年（就是南宋紹興十三年，1143）「於二月真元節設醮請經以為信受」（12a）。皇統是金熙宗的年號，這時北方土地多已淪陷，民間信仰猶戴漢臘，真元節的說法到明朝大家還繼續奉行，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

二

我們紀念老子，當然要知道他的思想，不能不研究他的著作。但是老子有留存在先秦古籍裏的名著《老子》，也有宗教信仰中他被崇拜為神之後的大量的著作。這些著作自然是依託的，除了做為是經典的那些，例如《道藏》中常見的用「太上老君說……」或「太上老君……」做經名的三四十種經之外，餘下還有許多的依託老子的旁的著作或詮釋老子的思想的書。這些書有不少我們還是該看的。我們試把《雲笈七籤》（《道藏》677-702）中見得到的它所鈔錄的用老子、老君的名義寫的書或說的話翻看一下，我們就大體知道在北宋以前（特別是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雲笈七籤》成書以前）人們所知道的老子在道教中的地位 and 風貌。

《西昇經》（《道藏》346-347）是一部依託關令尹喜記錄老子「西昇」之前告訴他的許多話。文筆是頗粗樸的，句子一般讀去，看是四言、五言的為多，但是也有七言或散體，有些句法很是拗



辰。書中第39章有「靜心守一，衆垢除，萬事畢」、「退官託疾，棄念守一，萬事畢矣」(卷下/22a)的話。檢《抱朴子·地真》(《道藏》870)「抱朴子曰：『余聞之師云：「人能知一萬事畢」(18/1a)，我疑心這種說法表現的是同一時代的思潮。《西昇經》開始第一句是「老子西昇，開道竺乾」(卷上/1a)，這句話沒有出毛病，因為《西昇經》這裏雖然說老子要西行去印度，但沒有說他去那裏「化胡」，所以後來的佛教徒也沒有過分攻擊《西昇經》，儘管它本身依託的時代是靠不住的。《西昇經》第7章上面有兩句話：「散析剖判，真偽別分」(卷上/18a)，這個意思是很好的。因為《化胡經》的事牽涉到老子本身，我想多用點時間把這事嘗試剖解數句。

自從東漢佛教入華之後，東漢末本土產生的道教，因為它開始還只是一部分地區的民間信仰，閱讀的經籍最早只有《五千文》(就是《老子》白文)。其他的有關教團組織、戒律、齋醮、儀軌以及別的闡發教義的經卷，都是沒有的。後來創立的教派多了，要想積極建設，最方便引進利用的，就是當時已經在各地流行的，並且能為喜歡談玄的上流社會士大夫階層的人接受的、翻譯過來的大批佛經、佛書。這種情形，又因客觀環境的需要而增加、而增勝。南北朝後期到唐朝，有時候朝廷還有所謂三教論講，那常是佛、道兩家在皇帝面前展開

教理、教義的熱烈辯論。這種辯論，雖很激烈，推行久了，後來常由儒教出身的一位大臣做出一番折衷的批評收場，慢慢竟然在學術界產生了三教同源、三教歸一的融和性的共識。這裏面連帶地有一點我得補充的，就是從西漢以來就和政府的官僚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儒家，其實不能說是宗教。上面提的三教的涵義，主要的祇是三種對社會各方面能夠發生影響的教化的理論和主張。

模仿和抄襲，並不是一件事。文化方面的交流，如果對方新的比我們舊的東西好，我們改用它，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我們只要隨便想一想，我們今天語言和文字裏應用的外來語有多少，那統計起來簡直可以說是教人吃驚，不過多數人習焉不察罷了。清末張之洞在武昌做湖廣總督的時候，看見公牘裏用的新名詞太多，就親自批注了「勿濫用新名詞」，卻被他的一個屬吏在公文上加了一句話頂回去了，說「新名詞亦新名詞」。這是一個真實的笑話。道經裏發見的佛經名詞很多，有的恐怕只可以說是襲用外來語，自然有的也可以說是襲用別人的故事。襲用別人的故事往往是影響最大的文化交流現象，這故事從一個地區慢慢地浸透到另外一個地區，常常靠的是自然消化、交融的力量。中國舊小說裏著名的《西遊記》，它的許多情節是由唐宋流行的變文、俗講，經過許多變化才在明朝嘉靖、萬曆年間寫成



佛教的四大天王(圖右)故實會出現於道經中。

我們今天熟悉的這個本子的。這個小說裏有一個猴子孫悟空，它的前身是印度史詩《羅摩衍那》(Rāmāyaṇa) 裏的哈奴曼 (Hanūman)。這個故事，流傳在東南亞各國民間裏不知道有多少年了，我們研究小說史的人卻還是「聚訟」，到了八十年代季羨林先生譯的八大本全譯本《羅摩衍那》出版了，爭辯的人有了原書最詳細的證據，這場筆戰才算平息。道經裏拿了佛經的材料做穿插的點綴，像上文所說，是很普通的。道經的書名用的文字，有些一看就像是抄襲性的，我們仍得仔細檢看、分析，才好下公平的論斷。《道藏》1058 有一部《太上中道妙法蓮華經》，這部道經單看書名，很像是抄襲佛經裏那一部《妙法蓮華經》，簡稱叫做《法華經》(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的。我們讀它一遍，和《法華經》對照一下，也有少數《法華經》裏人物的敘述，例如卷 8/2b-3b 敘「須彌山(Sumeru)者，是四大天王護世，鎮遏四方，依止而住」，下面就分段寫南、西、北、東四方各有無量七寶宮殿，分別由南方

毘留勒叉天王 (Virūdhaka)、西方毘樓博叉天王 (Virūpākṣa)、北方毗沙門天王 (Vaiśravaṇa) 和東方提頭賴吒天王 (Dhṛtarāstra) 護衛，這分明是佛教的故實，見《長阿含經》(Dīrghaāgama) 和別的經典。但是《法華經》裏其實沒有這些情事。毗沙門天王的字出現過兩三次，一提即過，毫不重要，毗留勒叉一次(鳩摩羅什 kumārajīva 譯本只用了持國天王的名號)，其餘的兩位皆未出現。這部道教的《妙法蓮華經》不過襲用了一個新穎的書名。這些天王們的故事，在民間傳誦的著作裏，就大是不同了。小說《西遊記》和《封神演義》裏都有這些天神。但是，毗沙門天王有了個中國名字，叫李靖，仍然是天王，叫做托塔李天王，這和唐代的名將李靖就攪合在一起了。小說裏他的兒子哪吒還保存了那吒 (Naṭa) 的原名，但是給他添上了金吒、木吒兩個哥哥，這位三太子大家就覺得並不陌生了。四天王都有了漢文姓名，是《封神演義》第 40 回出現的魔禮青、魔禮紅、魔禮壽、魔禮海，雖然姓得有點奇怪，小說裏說他們「皆係異人



秘授奇術」，也就將就了。這是中國民間的智慧。在道教的《太上中道妙法蓮華經》裏，日本的福井文雅教授指出了有一處，它的卷2〈諸仙大道品〉有些字句是襲用佛教《法華經》第十二〈提婆達多品〉的（《道教》第2卷，東京平河出版社，1983，頁111）。提婆達多（Devadatta）是娑竭羅（Sāgara）龍王年方八歲的女兒。相襲的地方，不過是說有位仙人來對國王說「若不遺我，當為宣說」某經罷了，這個國王佛經裏是世尊過去的前身，在道經裏就是元始天尊。佛經裏的仙人阿私仙（ṛṣi），道經裏面下一章〈順行品〉的阿斯仙人，也是承用他的。這些地方，我想還只是名相的問題。福井教授舉了《太上靈寶元陽妙經》（《道藏》169）卷6/19b有個長者的家裏失火，他雖然知道火害，「為諸子故，旋還救護，不見其難」的敘述，是從佛教《法華經》卷2〈譬喻品〉裏有名的火宅喻來的（前引，頁114）。這話也不錯。但是這個譬喻，在當時的佛、道二家裏恐怕已經是共識了。《無上大乘要訣妙經》（《道藏》31/3b-4b）裏，《法華》的火宅、三車之喻更是明顯了。但是這樣襲用的情形，大家都有；因為佛經翻譯的時候，為了要教人明瞭，也不能不借用中國傳統的用語和故實。不過，《老子化胡經》的情況和這些卻又不一樣。

現在留存的《老子化胡經》沒有完全的，唐高宗時活躍的王懸河編的《三

洞珠囊》（《道藏》782）收了不同的兩個本子的片段（9/6b-8a；14b-20b），其餘就是敦煌的幾個鈔本，只有少數是一整卷，其餘就是殘本。它們的題名，也不很統一，或稱《老子化胡經》，或稱《老子西昇化胡經》，《太上靈寶化胡妙經》，也只有少數可以讓我們考出寫經的時間。一般地說，這些雜亂的材料，成立的時間不出南北朝到唐代，甚或可能遲到宋代，我們恐怕見不到據說是西晉惠帝（290-306 在位）時道士祭酒王浮撰的這一部在佛教史和道教史同樣著名的偽經。

記載王浮撰偽經的這件事情，出於梁代慧皎著《高僧傳》（他是根據僧祐《出三藏記集》的）卷1的〈晉長安帛遠傳〉。〈傳〉裏講帛遠（他字法祖，又稱祖法師）死後，有一個叫做李通的人，忽然死後還生了，他告訴人在陰間：

見祖法師在閻羅王（Yamauājā）處，為王講《首楞嚴經》（Sūraṅgamasamādhisūtra），云講竟，應往忉利天（Trāyastriṃśa）。又見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被鎖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與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既曠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所歸，故死方思悔。

這位祖法師平時是很喜歡和人爭辯的，這篇〈傳〉的上文也說：「先有州人管蕃，與祖論議，屢屈於祖。蕃深銜恥恨，每加讒構。」所以他跟王浮鬥口氣



得王浮要著書來糟蹋他的信仰，大概是事實。雖然如此，我們如果根據我們現在能夠知道的各種《化胡經》來議論他，卻不公平。各種鈔本使用的文體十分俗陋，這且不說；許多地方提到「天尊」、「三清」這些用詞，恐怕就不是王浮所能知。敦煌本(藏巴黎)P3404<□□化胡經受道卷第八>說：

又極樂園者，在三清之上，長樂舍中，果成證道之處。忘心忘念，滅相滅神，不住有、空，无為湛寂，常樂我淨，始得託生。常住湛然，不生不滅，无上正真之大道也。

《三洞珠囊》9/19b引《老子化胡經》云：

胡王驚怖，語左右：「置向老公侍此大人邪？」老子知其欲化也，「此不為大人也，此名太上正真之人耳。此正真之人，好生惡殺，來至王國，過不犯王。王有何意，積薪以燒之耶？而今奈何復欲以侍之？乃欲免耶？」

後來胡王召三十六國胡子在老子面前誓信，老子見胡受化：

乃與作六十四萬言《經》，无上正真之道。(卷9/20a)

這一句「无上正真之道」，也見於《三洞珠囊》同卷引的鬼谷先生撰《文始先生无上真人關令內傳》。這篇<內傳>說老子化胡之後：

遂還東遊，幽演大道自然之氣為三法：第一曰，太上无極大道；第二曰无

上正真之道；第三曰太平清約之道也。

(9/14b)

查《三天內解經》(《道藏》870)裏也有「清約大道」之稱。它說：

蓋三道同根而異支者：無為大道、清約大道、佛道，此三道同是太上老君之法。(卷上/9b)

《三天內解經》裏也講老子在遠古的時候已經「帝帝出為國師」。它的紀錄老子降生為古帝時採用的名字(卷上/3a-b)和《三洞珠囊》引的《化胡經》(9/6b-7a)所記的，也有不少是相同的。《三天內解經》有內證(卷上/9a-b)是劉宋時期的道籍，前文引的<□□化胡經受道卷第八>，文中還有佛經常樂我淨之句，這話在漢語裏，最早當見於《大般涅槃經》(Mahāparinirvānasūtra)；而這部佛經，不論是北涼曇無讖(Dharmarakṣa)或東晉法顯所譯(稱《大般泥洹經》，都遠在西晉之後，卻頗接近劉宋的初期。我看我們現在讀的鈔本《化胡經》，至少有一部分它的寫作是南北朝時的產物。

三

從宗教信仰的觀點來說，紀念老君，更得研究先秦學術上的著作《老子》，因為這是道教經典裏一部最重要的經籍。東漢末三國時候信教的人都要讀《老子五千文》。南北朝時上清派的經籍有稱「常能讀《五千文》萬遍，太上雲龍下迎」(《上清太極隱注玉經寶訣》引《太上玉經隱注》，《道藏》194/7b)



的。傳授《道德經》，也有嚴肅規定的儀注，齋法；誦讀的範圍本文之外，還包括了河上公〈注〉、〈想爾注〉和〈老君思神圖〉這些部分（《道藏》989《傳授經戒儀注訣》；參看唐張萬福《傳授三洞經戒法錄略說》，《道藏》990；杜光庭《太上三洞傳授道德經紫虛籙拜表儀》，《道藏》566）。我們這裏只略說《老子》書裏的思想。談到《老子》的思想，這也是後世儒家許多人閱讀的書，有不少人爲它作過注疏。在三教調和的空氣之下，像明代的和尚德清憨山也寫過《老子解》。經過各種語文的翻譯，現在《老子》早已成爲世界上重要的文獻，思想家的寶庫，學術界的顯學。

《老子》的文字雖然只有五千言，可是句子古樸，有些地方還是用韻的。聽說道教節用的一個口號是樂道、順天，主要的是想從它豐富的內容裏，尋找出一個綜合性的、適合於現代生活的、處世做人之道。這個簡單的口號很好，我看是不容易才構想出來的，因爲《老子》簡短的五千文裏，其實含有三個方面的、不同的觀察，就是哲學家的宇宙論的架構；政治性的治國之道，和社會生活裏的做人的道德。用我們現在思考方式來說，它就是三個不同的東西：是玄學性質的哲學；政府學、特別是行政管理；和偏重倫理性的人生哲學。在它整個的81章裏，可以說有四分之一的章節是講政治的，講謙退、不與人爭的不過

10章左右；講不要盈滿、不要矜伐、「去甚，去奢，去泰」的，加起來不到10章；講很重要的「柔」和「慈」、「儉」的，也不到10章。還有就是講謀略或戰爭的，不到20章罷了。有很多章是跨兩三個項目，不能單放在某一項的，所以上面說的粗略的統計，也難免出現重複的地方。因爲《老子》81章的構成，是「聖人……爲天下渾其心」(49)的，它不能像我們現代的論文有那麼細緻的分析性。

因爲《老子》書的講法是籠統和連鎖性的，老子這個人在思想和志願上又是承襲歷史上伊尹、太公望、管仲這些「聖人」的衣鉢，是「以道佐人主」(30)者，所以書裏他講策略的地方很多，目的是給政治上的領導者看的，雖然用我們現代人的眼光看，這受益的人不一定是君主，也可以是一位大企業、大機構的管理當局、或是一個公司的老板。清末魏源著《老子本義》，說他「主柔賓剛，而取牝、取雌、取母、取水之善下；其體用皆出於陰。陰之道雖柔，而其機則殺」(〈論老子〉四，《老子本義》，《國學基本叢書簡編》，頁5)，這話恐怕就有些過分了。其實《老子》書裏講策略的地方，有許多處不一定是機詐詭譎，只是教人學聰明、學增加智慧罷了。從前林語堂先生翻譯《老子》收入他編的《中國和印度的智慧》(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 Random House,



New York)，這樣的命名是很合適的。歷史上有三位皇帝：唐玄宗，宋徽宗和明太祖都替《道德經》作過注，他們的《注》都收在《道藏》裏(354-362)。滿洲人入關後的第一個皇帝順治(福臨)也有兩卷《道德經御注》。我們知道他的漢文程度不好，這書也許是臣工代撰的。但是這也說明帝王們都明瞭《老子》的思想裏有治理國家的重要線索和關捩。

西方的哲學家很多人(包括柏拉圖 Plato)把他們的構想分成兩個世界：現實世界是不夠好的，或不真實的，或是感覺的，現象的，而理想的世界則是永久的，理智的概念。和儒家的想法分別不多的，是《老子》書裏「道」的架構，也是現實的，雖然它比孔子說的「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論語·陽貨》)要有系統些。它說道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25)的；它的深湛，是「淵乎似萬物之宗」(4)，又是「萬物恃之而生」(34)的；這就夠了。說「道」是「唯恍唯忽」、「窈兮冥兮」(21)的，都只是抽象的形容詞。道和萬物的真正關係是母子關係：「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51)，這樣就交待了「道體」和現實世界的關係了。道是母體，萬物(包括人類)是子體。這些說明白了，剩下就幾乎全是現實世界的事。老子或《老子》書裏，可從來沒有把現實社會當做非真實的。如果他說「治人、事天當用嗇」(59)，「治人」固然是人的

事，「事天」也是教人怎樣去事天，這裏面不能沒有人。

現實的世界，有生命活躍的世界，人所最關心的，就是「生」。我們對生命的關懷，從生命開始的第一天，大家對孩子的父母的祝賀，就會表現出來。要是小孩子在公家醫院出世，是在元旦凌晨開始的時候，那簡直要上電視，表示社會上大家對於新生命的喜悅。除了父母、親友們的撫育、愛護，一般的人對於兒童，也有很大的好感。以老子為首的道家，自不例外。《老子》書裏提到兒童的地方很多，他簡直教人學嬰兒：

專氣致柔，能嬰兒乎?(10)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55)

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20)

聖人皆孩之。(49)

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20)

我這裏用的，是河上公本。(《道藏》363；嚴靈峯先生輯《無求備齋老子集成》收的河上公《注》是南宋劉通判宅刻的呂祖謙校本。)這些地方，文字的出入還不大，我想各本都可以用。這裏引的最後一條「復歸於嬰兒」是最可注意的。它簡直教我們要回到自己做小孩子的時代了!這恐怕也是常情。我們成年的人，更不用說老人，心裏有時候也不免回憶我們的童年渾渾噩噩、什麼都不需自己經管，什麼責任都不須負的時代。



其實，我們要是問一問兒童自己心裏的想法，他們想的就是要做大人，一年比一年增加的強烈希望，就是怎麼還不快做大人。我們完整的教育制度，就是幫助大家怎樣從兒童生活進步到做大人。

但是老子觀察到人生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年富力強精力彌漫的成年的日子是不能長久的，像好花好景，雖然燦爛，它也沒有辦法長期地支持不變。到了由壯而老的境地，就很難堪：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則已。
(30, 參看 55)

木強則兵。(76)(馬王堆甲本，兵字作恒，乙本作競；河上公本作共。這裏從通行的王弼<注>。)

老子的看法是若要不衰老，最好要保持長期的嬰兒狀態。嬰兒的狀態既不可得，那麼凡事都回頭想一下、退一步，退到回復到一半的樣子，這樣做的人就可以多保持些年青的境界，如果處理事務，考量問題，也多了些思考的空間。我們讀道籍，都知道有不少道經裏都講人身裏有很多神，幾乎身體的每一個部位都有神。值得注意的是，這許多人身神他們的形相都是嬰兒。(看《大洞玉經》，《道藏》18；《上清大洞真經》，《道藏》16-17，最為明顯。)(《大洞玉經》有韻句說：

徘徊三清上，和樂返嬰童。太治三炁周，真文肇生明。(卷下 / 5b)
又說：

混合帝一室，五老變孩童。(卷下 / 6b)

我猜想這恐怕都是老子回歸意識的反映。這種回歸，用《老子》的話，就是「歸根」。《老子》說「歸根曰靜，是謂復命」(16)，河上公《注》解釋這一章說「靜謂根也。根安靜、柔弱、謙卑處下，故不復死。」(《道德真經註》，《道藏》363，卷 1/13b)這一章的上面一章也說「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15)

老子自己解釋這個退後的、復命的哲學，說：「反者，道之動。」(40)道的進行的軌跡是常常不忘退路。我們現在說「順天之道」；老子就告訴我們說「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65)

這樣的「順天之道」，其實是很違反我們平常往往從自己的、不免有些自私的觀點去處理生活上的許多事情的。這樣做時常就不免要違背從比我們高一層看的，所謂天之道。老子說：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77)

各位！我們紀念老子，不是要想實行這個天之道麼？☺